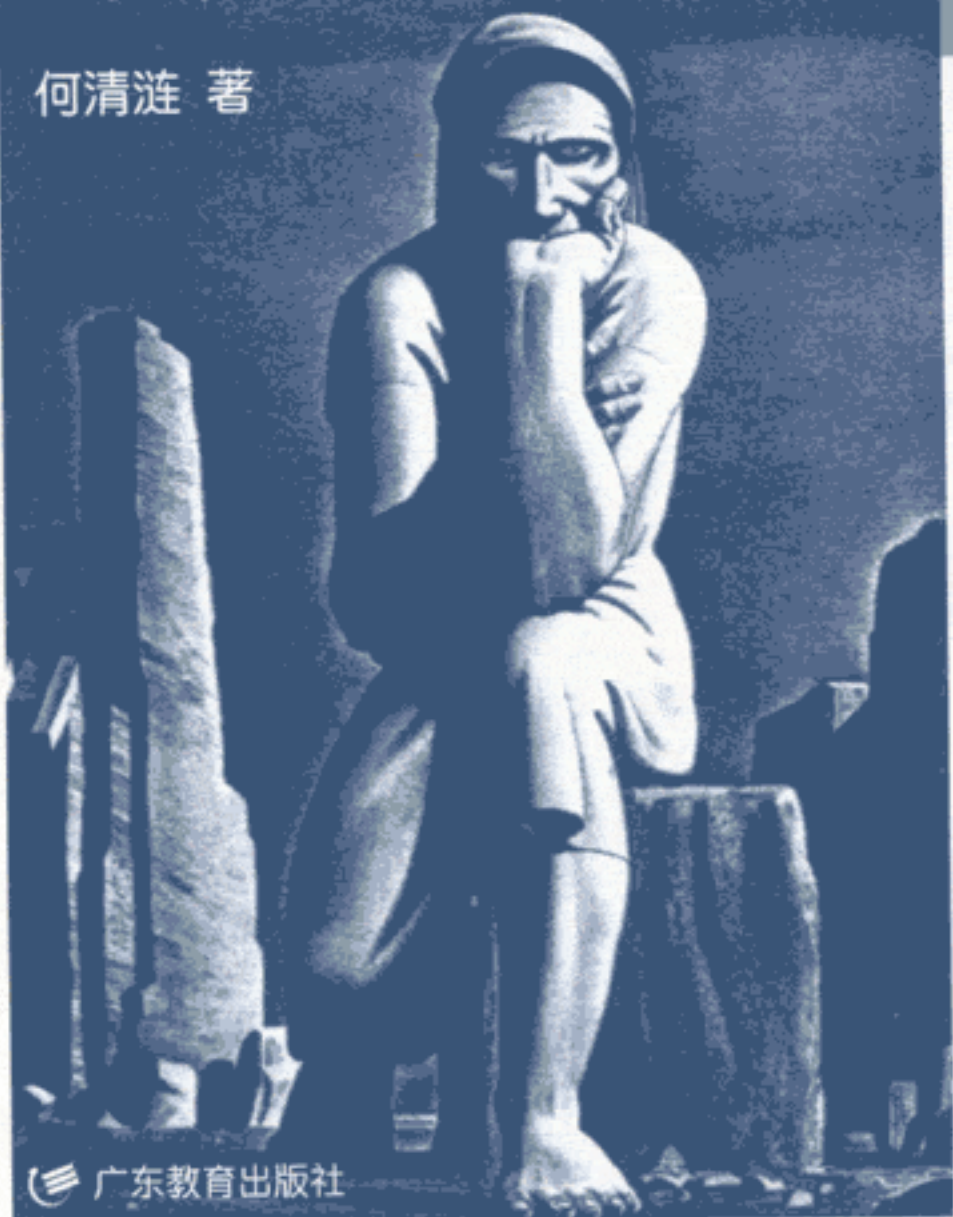


荒原学术文丛二

# 经济学与人类关怀

何清涟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 经济学与人类关怀

何清涟

博 库

中国·美国·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00.com.cn](http://www.BOOK00.com.cn) 和/或 [www.BOOK00.com](http://www.BOOK00.com)) 下载的作品,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 博库公司(BOO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00, Inc.)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00”, “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00, Inc. 的商标。

## 作者简介及创作年表

何清涟，女，1956年生，中国湖南省邵阳市人。

1985年毕业于中国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中国复旦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曾先后在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现居深圳，供职于《深圳法制报》社，任专刊部副主任，主任记者。

现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聘为特约研究员。

本人近年来专门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尤其是对中国社会转型期资本形成的特点，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等各种社会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冲突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这种研究成果的主要代表作为《现代化的陷阶——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此书被评为当年非文学类最佳书籍之一，并被多家报纸杂志评为当年畅销书榜首。现正在译成英文，拟出英文版），《经济学与人类关怀》两本著作。

美国《摘业周刊》1999年6月14日“亚洲之星”专

号曾将本人评为“亚洲之星”。日本外务省、美国国务院新闻文化署先后邀请本人至该国访问。近几年曾至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做访问学者。《三联生活周刊》（199年11月30日）曾将本人列为25位时代人物之一。

### 主要著作：

1、《人口：中国的悬剑》，该书收入《走向未来》丛书中出版（1988年3月），1996年此书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收入《希望书库》再版，该书库由建国后出版的所有书籍中共遴选五百本，各印一万册，分送各地希望小学图书馆。

2、《现代化的陷阱——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国外版名《中国的陷阱》（1997年9月出版）。本书对中国改革以来有关国家资源分配领域内产生的经济问题，以及这些经济问题产生的制度环境，尤其是权贵私有化进程及各种事后不良社会反应进行了深刻剖析。此书在中国大陆已有《读书》、《粤港信息日报》、《南方周末》、《天涯》等数百家报纸进行专栏评论，1998年10月美国《纽约书评》亦发表长篇评论，随之美

国《远东经济评论》、《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二十余家报刊杂志也予以报道。

3. 《经济学与人类关怀》，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1 月出版。

4. 参予《中国现代化史》的撰写工作吗（第一章和第六章）。此书由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出版。

5. 参予《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 27 个问题》的写作，撰写“国家资源的分配”一章，该书 1997 年 3 月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为当年中国畅销理论书榜首。

历年主要学术论文：

1. 《清末大量外债及其分析》（《财经研究》）1986 年 12 月）

2. 《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和人口压力的关系》（《中国农史》1987 年第 4 期）

3. 《清代的人口压力和租佃形态》（《江淮论坛》1987 年第 6 期）

4. 《人生与历史》（《书林》1987 年第 7 期）

5. 《封建商业繁荣的背景分析》（《探索与争鸣》1988 年 3 月）

6. 《梦想与命运》（《书林》）1989 年第 7 期）

- 
- 7、《家族本位与中国商人精神》（《思想家》1988年创刊号）
- 8、《‘经济人’与‘道德人’：两种财富观的比较》（《二十一世纪》1990年12月号，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出版）
- 9、《中国当代农村宗法组织的复兴》（《二十一世纪》1993年4月号）
- 10、《中国股份制：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二十一世纪》1994年2月号）
- 11、《九十年代的圈地运动》（《二十一世纪》1995年6月号）
- 12、《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二十一世纪》1996年4月号）
- 13、《农村基层社会地方恶势力的兴起——与王旭商榷》（《二十一世纪》1997年6月号）
- 14、《世纪之交中国将面临的金融危机》（《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
- 15、《财富与贫困——现阶段贫富分层评析》（《东方》1995年第5期）
- 16、《权钱交易：中国当代寻租活动的特点、途径及
-

社会成本》（《东方》1995年第6期）

17. 《〈人口问题：古老的祭坛〉》（《东方》1996年第2期）

18. 《股份制：逆境中的政策选择》（《开放时代》1997年九、十月号）

19. 《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读书》1996年3月号）

20. 《经济学理论与屠龙术》（《读书》1997年3月号）

21. 《金融危机挑战经济奇迹》（《读书》1997年12月号）

22. 《改制王牌不能滥用》（《做书》1998年1月号）

23. 《适者生存与有闲阶级》（《读书》1998年第10期）

24. 《财富的困扰》（《长涯》1996年第6期，该杂志由韩少功任社长）

25. 《灰色女性及其它》（以未名的笔名发表于《天涯》杂志1997年第2期）

26. 《学术泡沫与国情研究》（《天涯》1997年第4期）

27. 《什么样的发展？》（《天涯》1998年第1期）

28. 《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变》（由香港大学文化研

研究所收入《中国近现代经济伦理论文集》中出版 [1998年])。

29. 《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 ([美]《当代中国研究杂志》1999年第1期)

30 《中国经济的断裂带——中国经济隐患分析》 (载于《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此文被海内外10余家报刊杂志转载刊登)

31、《学术泡沫“儒家资本主义”的破灭》 (《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10月10日)

32、《S市乡村社会的重组过程》

——S市罗H区农村城市化进程的调查

(本调查是本人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所做课题报告,全文45000字)

33.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 (《书屋》杂志1999年第4期)

34. (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形态之根源分析) (《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美]《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4期)

35、《漫游两百一十年以前的美国费城》 (《书屋》杂志1999年第5期)

36、《当代中国社会的认同危机》

——法轮功事件的启示（「美」《当代中国研究》1999  
年第3期、

《书屋》）1999年第5期）

37、《中国人为什么不花钱》（《视点》杂志1999年第  
9期，《读者》2000年第6期转载）

38、《胡雪岩现象与中国三代商人》，（《天涯》1999  
年第6期）

39、《中国当代制度性腐败的二阶均衡分析》（《中国  
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春季号）

40、《知识差距：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万科周刊》  
1999年总第377期，《读者》1999年第10期转载）

41、《世纪末：关于财富的断想》，（《万科周刊》1999  
年总第347期，《读者》2000年第4期转载）

42、《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书屋》2000  
年第3期）

通讯地址：中国广东深圳市莲花北村32栋303室

邮政编码：518036

电话号码：0755—3060751（H）0755-5591445（O）

0755—3942593（H）

E-mail: hu192@21cn.com hhh@163.net

www.BOOKOO.com.cn

---

All Rights Reserved By BOOKOO, Inc.  
博库版权所有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代序：思想的飘泊者

从未想过我的文化“归属”问题。但最近的一些提法却使我对此感到糊涂，迫使我不得不对自己的“归属”开始在意起来。

《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出版以后，杂文家丁东写了一篇书评，说是北京为中国思想界龙头，上海次之，广东较前两地自有不如，但近年来在全国引起极大震撼的三本书（《山坳上的中国》、《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现代化的陷阱》）与最近撼动中国知识界的长文《胡风事件：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林贤治著）却都是广东学者写的。他由此提醒大家注意广东文化这一精神特质。在与深圳一些朋友的谈话中，也发现不少人认为《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代表了深圳学界的水平。开始还不太在意，听多了以后，便开始思索：我到底与广东文化（不是岭南文化）有什么渊源？我能代表深圳学界吗？那天朋友L与我通电话时，因他也来深圳数年，好歹算是“共一城风雨”，于是我向他谈了这一困惑，他断然告诉我：拿一个与广东毫无文化渊源、只是寓居深圳的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这一

地域区域性文化的代表，本身就很牵强。

我对 L 这一看法颇为赞同，于是开始认真思索这一问题。

根据我的想法，构成一种文化恐怕必须具有几个要素：一是共同的兴趣与话题，二是有共同的文化阵地，三是还要有某种相通的精神特质。比如构成中国思想界就得有这几个要件：首先大家都关心中国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历程；二是有共同的文化阵地，如《二十一世纪》、《东方》、《读书》、现在还加上《天涯》；三是这几个刊物上常发文章的主要作者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以这一标准衡量，不用说深圳，就连广州也还只是初具雏型，如广州以中山大学、华南师大、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一批学者构成的一个松散的文化圈。但距离成熟却还有几步艰难的路要走，关键是还没有出上几个在全国思想界有代表性的学者，也没有在全国得到公认的有水准的思想性刊物。不过那些学者都很年青，大都是 45 岁以下，且有治学宏愿，假以时日，或能形成新的广东非主流学术文化（主流文化指政府认同的文化）。

深圳显然没有这样一个文化圈，或者有，但那至少不是我的学术活动天地。

深圳学界本身显然没有共同感兴趣的学术话题，如有之，那也是由于某种别的原因。

在深圳谈各人的文化渊源显然没有意义，因为深圳年轻，没有多少人是“深圳文化”培养薰陶出来的。但至少有几样构成“圈子”要义的东西不可没有，这几样东西是：第一，深圳提供的公共论坛；第二，深圳提供的学术资源（包括研究经费与养活学者的生活资源）；第三是学界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有“圈子”才有代表，否则又能代表谁？

上述三个条件对我来说并不存在。首先，我那些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关注的学术文章没有一篇发表在深圳或广东，深圳没有给我提供活动舞台；其次，我没有享有深圳为我提供的任何学术资源；第三，在深圳几乎很少与人切磋学术思想，多年来几乎是在一种绝对孤独的状态下完成我的所有研究工作。在精神上认同我的朋友大多都在北京，还有少部分散居在全国以及世界各地。我是谁，我正做什么，我做的东西对中国当代具有什么意义，越离我近的人越是不知。这两年由于一些在报刊杂志工作的朋友渐渐知道了我，才开始有点随意之笔在深圳的报纸上偶而露露脸。至于北京等地约我写的稿子，从题目上来说就不是深圳学界的公共话语，如“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祭”，“改

革开放二十周年谈”等等。

我“流寓”深圳 这词或许不太妥当，但陈寅恪始终被认为“流寓岭南”，在此不揣冒昧地借用 对这个繁华金粉地始终抱着一种看客心态，不失时机地观察着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所谓职业在我看来，有如伦理学鼻祖斯宾诺莎以磨镜子解决谋生一样，始终不是我纵意驰骋的领地。一些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生活方式和一般深圳人大不一样，深圳的一切流行东西与我几乎绝缘。

只有一样属于深圳，那就是我的研究对象资源。但那也不是我独有，来深圳的人也有好几百万，不少体制内的学者还拥有我这一体制外的学者无法拥有的优厚学术资源。在研究对象资源上，我与他们是平等的，不会更优越。

深入思索上述问题时，我的一个想法逐渐明晰起来，那就是文化本来不应该划地为牢，强要划分什么“地域文化”之类。

一些属于人类共同的文化从没有地域划分，也难于按地域划分。马克思身为德国人，但他的煌煌巨著《资本论》等却都是在英国完成，难道他就因此代表英国文化？但英国人确实有理由因马克思而骄傲，所以当德国要求将马克思迁回德国重新安葬时，英国人理所当然地驳斥：你们当

初将他赶出国门，如果不是我们容纳了他，世界上还会有马克思吗？冈纳 缪尔达尔的《亚洲的戏剧》是他在南亚诸国调查十年的结晶，但他并不代表南亚文化，他代表的是经济学中的瑞典学派。多年来《二十一世纪》成为全世界华人（或华裔）学者的公共论坛，但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谁也没有说自己代表法国或美国文化，大家都是将自己看作炎黄子孙。这份杂志的主编原为大陆 80 年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至今流寓香港近 10 年，可从未有人将他看作香港文化的代表。韩少功时下寓居海南，但他代表海南文化么？

我的精神故乡在哪里？当追问到这一点时，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掌故，当 1 十余年前《知识分子》杂志从美国移师回中国时，曾宣布是回到它的“精神故乡”北京。北京之于中国思想界的意义，在这里绝对不是地域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前些时刘小枫来深圳，交谈中他突然问我，对北京感觉怎样？我告诉他，北京自有其恢宏博大之处，但现在来说于我已不合适，我已不习惯在喧嚣中做学问，也不喜欢牵涉到学派之争中去。他说自己深有同感，但在随后那一刻静默中，我明白我们两人想的是什么，其实我们的内心深处，大概都是将北京认作精神故乡，因为

那里到底是中国文化的堡垒，那里有对我们最到位的理解，那里的朋友不管见过面还是无缘见面的，都是我们治学精神的最佳解读者。他们对我这些年来的研究，比与我相距咫尺的深圳人要熟悉得多。多年来就是北京与香港等地给我提供了广阔的学术活动舞台，提供了深刻的理解和精神支持。当我向他们征询“我是否代表深圳文化”时，他们感到很吃惊，因为他们从未想到过还存在这一话题。

但是我之存在于深圳这一文化现象又确实值得研究，因为在深圳还有两三个与我一样的人，其中之一是蒋庆。蒋庆研究的儒学也完全与深圳无关，他的活动舞台、理解者也基本上不在深圳。我与蒋庆未认识之前，一些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认为我们简直无法谈到一起，因为学科相差太远，一个秉持传统儒学，一直希望建构与恢复中国传统的道德和政治秩序的意识形态，“道”与生命已经融为一体；另一个则满脑子自由、民主、人权、法制观念，更看重社会秩序和人性秩序的建构等工具理性层面的理论，这样两个人又怎能谈到一起？但奇怪的是我们认识以后居然有不少共同话语，后来一想，共同点在于两个人所秉持的学术良心，在于两个人都以思想为“志业”，都在苦苦“求道”，都希望中国能建立一套关于自然、人类和人生意义